**官方國族敘事與中國民族主義思潮下的「學術研究」研究：以郭廷以、凌純聲為中心**

**全文概要說明**

　　民族主義思潮，乃是近百年中國歷史發展的最大動力。意識型態歧異的近代中國菁英雖共享以「中華民族」為名的國族敘事，但細觀共產黨員李大釗，與國民黨員孫文、蔣介石，或其他的政治人物、學者的詮釋便有頗大的差異，由此亦可見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複數性。然而，1928-1987年間「國民黨專政」下的中華民國政府，將孫文、蔣介石對中華民族的詮釋，作為其國族建構（nation-building）工程的一環，乃成為Homi K. Bhabha所言，由上至下，對言論思想具有箝制性、訓導性的官方國族敘事。官方國族敘事的內涵，乃是一套陳述民族起源、形成與發展的故事。另一方面，在近代中國民族主義思潮下成長的學術菁英，也在學術研究中展現對「中華民族」相關知識的高度關懷。本文的興趣在於探索，官方國族敘事與學術研究，兩者對中華民族的起源、形成與發展的詮釋分別為何？有何異同之處？以一九四九年國民黨政府遷台為分水嶺，時代背景對兩者的主張分別有何影響？本文選擇的個案：以全國最高學術機構－中央研究院創辦「近代史研究所」的郭廷以、「民族學研究所」的凌純聲，作為學界的代表。並從以下兩點思索：第一，郭、凌兩位學者，在同一時空下生產的「學術知識」，其觀點卻有所差異，並深入分析造成差異的原因。意即，郭氏的「中國近代史研究」、「歷史教科書」（主編）對「國族自我／他者形象」的詮釋有所不同。此情況也發生在凌氏的「中國民族學研究」、「中國邊政研究」對中國民族起源和組成的解釋之差異。第二，戰後台灣學術史的兩個傳統－橫向移植的「中國學術傳統」、縱向繼承的「殖民地學術傳統」。因此，本文從「中國學術傳統」的脈絡，思考受到近代中國民族主義思潮衝擊的兩位學者，在1949年後的不同時空背景下，其學術所關懷議題之變遷。再從「殖民地學術傳統」的脈絡，思考日治時期的台灣史、台灣原住民研究，在資料運用和觀點詮釋，和郭、凌兩人所代表的「中國學術傳統」的異同何在。本文最終目的，在於考察官方國族敘事在特定歷史條件下「被發明的過程」，以及其與學術研究的互動關係。並試圖解構強人威權體制下被視為「歷史事實」的中華民族觀、批判當代學術社群「忽略」民族主義／官方國族敘事對學術研究可能產生的影響。

　　　本文的研究架構如下：第一章為導論，第五章為結論。正文共計三章，以下說明之。

第一章　緒論

　　「中華民族」乃一由晚清學者梁啟超發展出來，用以代稱中國的國家與民族之詞彙，在立憲運動的浪潮中逐漸流傳於晚清的思想界與政界。 中華民國成立後，「中華民族」此詞彙之內涵漸確立以「團結中國境內各族群」、「對抗外來民族」一套有系統，且廣為中國政學兩界菁英所採用的國族敘事。 此敘事透過教科書、大眾傳媒等當代傳播工具，逐漸從少數菁英間傳遞到普羅大眾的生活之中，成為Benedict Anderson所言，近代民族主義思潮下，為增強境內群眾國族認同所形塑的「想像的共同體」。 而從習、馬兩人的文告，可知該敘事仍持續影響至今中台兩岸的政局。事實上，此套國族敘事乃是近代中國民族主義思潮下的一環。若沿著近代中國史的脈絡考察，就會發現民族主義兼為歷史發展的原因和結果－既是促成某些事件爆發的動力，又多因這些事件而進一步激發民族主義風潮的「上升」。 如果剖析晚清以來各種激進與保守，改良與革命的思潮，就會發現其中均含有對民族主義的關懷。 因此，當代中國思想史的巨匠余英時先生認為民族主義思潮，乃是近百年中國歷史發展的最大動力。 意識型態歧異的近代中國菁英雖共享以「中華民族」為名的國族敘事，但細觀共產黨員李大釗，與國民黨員孫文、蔣介石，或其他的政治人物、學者的詮釋便有頗大的差異，由此亦可見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複數性。 然而，1928-1987年間「國民黨專政」下的中華民國政府，將孫文、蔣介石對中華民族的詮釋，作為其國族建構（nation-building）工程的一環，乃成為Homi K. Bhabha所言，由上至下，對言論思想具有箝制性、訓導性的官方國族敘事。 官方國族敘事的內涵，乃是一套陳述民族起源、形成與發展的故事。另一方面，在近代中國民族主義思潮下成長的學術菁英，也在學術研究中展現對「中華民族」相關知識的高度關懷。 筆者的興趣在於探索，官方國族敘事與學術研究，兩者對中華民族的起源、形成與發展的詮釋分別為何？有何異同之處？以一九四九年國民黨政府遷台為分水嶺，時代背景對兩者的主張分別有何影響？

　　從上可知，本文感興趣的議題，與民族主義有密切的關係。因此，有必要對「民族」（Nation）、「民族主義」（Nationalism）加以定義與限制。關於該詞彙的界定與研究，歷來在不同學術領域均累積豐碩的成果。本文屬於歷史學範疇，故捨棄Ernest Gellner等結構功能論，強調實證的研究途徑，採取偏向歷史制度論、強調時空脈絡的研究途徑。Anderson認為「民族」是某些人民，透過「主觀的認知」所形成的「想像共同體」，且共同體擁有「主權」和「邊界」。 Balibar認為一個社群團體形成的決定性因素，不在該群體所具有的血統、語言、宗教等文化內涵，而在於區隔內外的「邊界」（boundary）。 Bauman則指出「民族」塑造過程的首要任務，在於畫定「我族」與「異族」之間的「邊界」。 就民族塑造過程而言，Anderson肯定「群體對自我的想像」－「主觀」因素的重要性，Balibar則直指語言、血統等「客觀」因素較為次要，而三位學者均肯定「劃定邊界」是塑造「民族」的重要關鍵。「民族主義」－Anthony Smith則指出是一種意識型態的運動，用以獲取與維繫一群人（a population）的主權、團結與認同。這群人之中有人認為擁有組織「民族」的實際／潛在之需求。 綜合上述說法，並配合題旨，本文將「民族」定義為：一群人中具有發言權者，透過主觀的想像畫定一道區隔「他者」邊界，所創造出的「我群」。「民族主義」則是塑造「我群」，並凝聚其認同的意識型態運動。「(中國)民族主義學術觀點」－則意指郭廷以和凌純聲以「內括性」（inclusive）和「排除性」（exclusive）為原則，透過設定「中華民族」的邊界，並製造邊界內外人群之形象差異的「學術書寫方式」。本文所感興趣的，即是官方國族敘事和學術研究，兩者如何定義我群／他群？如何包括（inclusive）我群？又透過何種方式來排除（exclusive）他群／他者？我群／他群的界線何在？

　　本文的研究個案之決定，則依據1949年以後的台灣史為主、1928年以降的中華民國史為輔的兩條脈絡，挑選在最高學術機構－中央研究院，分別創辦「近代史研究所」、「民族學研究所」的郭廷以、凌純聲兩位學者為考察對象。筆者初步檢索郭、凌二位的學術「生涯發展」和「研究類別」，發現可從下面兩個大方向來剖析他們的

學術研究。第一，剖析兩者學術生涯發展與時代背景的關係：就中華民國史的脈絡思索，受到近代中國民族主義思潮衝擊的兩位學者，在1949年前後的不同時空背景下，其學術所關懷的議題有無轉變？就台灣史的脈絡思考，兩者所代表的「中國學術傳統」對特定議題－台灣史、台灣原住民的研究上，與戰前的「日本殖民地學術傳統」，在資料運用和觀點詮釋上，有哪些異同？ 第二，剖析兩者在不同的研究類別中，針對特定議題的解釋，觀點有無差異？並深入分析差異的原因為何？舉例來說，郭氏的「中國近代史研究」、「歷史教科書」 （主編）對「國族自我／他者形象」的　　　　　詮釋有所不同。此情況也發生在凌氏的「中國民族學研究」、「中國邊政研究」對中國民族起源和組成的解釋之差異。

**第二章　近代中國民族主義興起與官方國族敘事的發展**

　　本章回顧近代中國民族主義興起，集中於探討近代中國國族敘事形成和官方化的過程，並討論官方化的國族敘事和「學術研究」的關聯性。第一節，討論晚清立憲派的五族共和思想、革命派的大漢族思想，釐清兩派民族思想的差異，如區隔「我者」與「他者」的邊界，以及對中國境內漢族與少數族群的關係。接著說明民初官方為何採取五族共和論的時代背景。第二節，首先討論近代中國民族主義思潮下，中國民族關鍵詞－「中華民族」被創造的過程，以及當時的不同派別的知識份子如何使用此詞彙。其次，討論晚年的孫文如何結合「中華民族」此詞彙，以及漢族為核心的「民族同化理論」，成為一套界定民族內外邊界的近代中國國族敘事－「中華民族論」。最後，討論蔣介石的民族思想，特別著重於其對境內各族群關係和對境外各國關係的主張，以及蔣氏的民族思想和孫文的差異處何在。第三節，討論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七五年間，由蔣介石主政的中華民國政府，如何將孫文、蔣介石思想為核心的中國國族敘事，透過國民黨政府的統治制度形成所謂的「官方」敘事？又如何透過官方民族政策、官方文宣，將此套官方敘事，從知識菁英階層，傳遞至平民和全國的過程。依此目的，該節首先討論民國成立後，「中華民族論」的國族敘事如何透過官方政策被制度化的過程。其次，討論官方國族敘事在中央政府撤退來臺後的發展。第四章，以郭廷以所主編的中學教科書，和凌純聲撰寫的邊政研究，來討論官方國族敘事與學術研究的關聯性。後半部以兩類性質介於「學術」與「政策實務」／「教育」的史料－邊政研究和教科書，弭補本文結構上將「官方敘事」和「民間學術」二元對立看待的不足。相比「中國近代史」研究、「中國民族學」研究，「歷史教科書」、「邊政研究」並非純然的學術研究，分別帶有教育、國策建議之功用。因此，第四節將利用此兩類「知識生產」的媒介，釐清官方國族敘事和學術研究的關係。該節首先概述郭、凌兩者的生平、以及參與教科書編寫、邊政學研究的前因後果。其次，討論教科書、邊政學的定義與性質。最後，則分析郭、凌二人所生產的教科書和邊政學對特定議題的論觀點，並與官方國族敘事做出比較。

　　Gellner指出民族主義者看待疆界內外的態度截然不同：對外創造差異；對內創造相似。從第二章對晚清立憲派、革命派、孫文和蔣介石的民族思想的剖析，可得到相似的結論。晚清立憲派人士提出五族共和主張，提倡團結中國境內各族，打倒境外列強，其疆界線為「清帝國領土」。晚清革命派人士則主張驅逐滿族，恢復漢族政權，其疆界線為「漢族」。民國成立後，以孫文為首的革命派人士，在現實考量下，無論是沿襲立憲派「五族共合」主張，或「多元同化論」、「同元論」的主張，疆界線為「中華民國領土」。確立疆界線後，再對疆域內外的各類人群做出定義。就疆域內部而言，中華民國作為一個多族群國家，內部各族群彼此的關係、與國家的關係，是近代中國民族主義者思索的要點之一。孫文以漢族為中心的同化論－「中華民族論」，來詮釋少數民族被漢族同化後，合稱為中華民族的過程。蔣介石則稍加修改孫文學說，以蘊含儒家色彩，本質為「同源論」的「中華宗族說」來詮釋境內少數族群與漢族的關係，以及國土不可分割的道理。而就疆域外部而言，孫文雖提出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但並無特定的指涉對象。蔣介石為因應先後遭逢中日戰爭、國共內戰失敗後的國家處境，以日本帝國、蘇聯為「侵略外敵」、中共為「民族叛徒」，形塑三者的形象，來創造國境內外人群的差異。上述由孫文、蔣介石確立，以「中華民族」為名的國族敘事，是一套陳述民族起源、組成和發展的故事。此套敘事經過南京國民政府、蔣介石治台時期的法制化後，成為一套施行於中華民國政府統轄區的「官方國族敘事」。而此套敘事是否對言論具有實質箝制力？從上述討論可知，由於法制不夠完備，南京國民政府時期「官方國族敘事」對言論的箝制力有限。事實上，當時主張社會主義、對國族有不同想像，或批判國民黨的民族政策者，仍可有限度的發表於公開場合之中。蔣介石治台時期，由於法制的完備，對言論的箝制力則較深，此時社會主義和台灣獨立的主張已不能在公開場合發表。

　　「官方國族敘事」具有法律效力，但對「學術研究」的實際影響為何？這是本文想討論的議題。第四節的研究成果指出，郭廷以的「歷史教科書」對中國「史前史」、「近現代史」、凌純聲的「邊政研究」對中華民族的起源和組成、「邊疆行政」和「邊疆現勢解析」的觀點，與官方國族敘事是一致。此顯示兼具官派教科書主編和歷史學者雙重身分的郭廷以、兼具邊政官員和邊政學者雙重身分的凌純聲，在編寫教科書、撰寫邊政研究時，分別選擇站在官派主編和邊政官員的身分，宣達官方意識型態，此乃時代心靈的侷限。那麼，郭廷以從事「中國近代史」研究、凌純聲從事「中國民族學」研究時，是站在專業學者的立場呢？還是依舊站在官方的立場呢？此問題之解答，有待下兩章的深入討論。

**第三章 中國民族主義思潮下的「中國近代史」研究：以郭廷以為中心**

　　第三章，可分為兩大節。第一大節，將以「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近代史」發展與郭廷以的學術研究」為題。第一小節，首先陳述西方現代史學觀念傳入中國，以及「中國近代史」學門被建置化的過程。第二小節，首先將重點置於1920s-1940s年代日本帝國、大英帝國和蘇聯等帝國主義侵入中國邊疆地區的時代背景下，學術著作與中國民族主義的關聯性。其次，將考察南京國民政府時期，以蔣廷黻、郭廷以為代表的「近代化學派」，與以李鼎聲、范文瀾為代表的「史觀學派」，對於「中國近代通史」的觀點與詮釋，以及兩者與中國民族主義的關聯性。再者，以劉彥的著作為例，考察近代中國外交史的淵源和題材，與民族主義的關聯性。第三小節，將考察遷台前郭廷以的學術著作內容，除簡短介紹其對太平天國，和中國近代通史史料的彙編外，將重點置於其於1930s年代撰寫的《中國近代史》，分析其內容的史觀為何？**第二大節，**將以「戰後台灣的「中國近代史」發展與郭廷以的學術研究」為題。第一小節，先考察日治時代「支那史」，在戰後初期如何轉置於「中國史」的過程。第二小節，考察1950s-1970s年代，國際間美蘇冷戰，與台海兩岸對峙下，台灣的「中國近代史」的發展過程。第三小節，將考察郭廷以遷台後的學術著作內容，以其對1.近代通史、中國外交史2.近代邊疆史為例，檢視其著作中，近代化史觀和民族史觀如何競奪？不同時期史觀的異同處何在？與國際學界，和中國民族主義的關聯性為何？

　　以下分幾點陳述本節對二十世紀初期中國近代史的研究發現，並做更進一步的省思：第一，論者指出晚清史學具備「經世」和「考據」兩種基調，經世的基調則以民族主義為線索。而此股風潮似乎在民國初年持續延伸之，在此雙基調下，西方歷史學的實證主義與民族主義同時受到中國史家重視。而做為新興學門的「中國近代史」，兼含考據－「科學治史」，與經世－「民族主義史學」的雙重性。如以「近代中國外交史」此題材為例，一方面強調在史料運用上須留意多語言／國家資料的參照，以及謹慎的史料考證；另一方面，其中外關係的史實之篩選，卻以列強侵華、國難/國恥、外患為軸心，帶有濃厚的民族主義色彩。第二，專研「中國近代史」的學者也多援引當時西方而來的社會科學理論，馬克思階級鬥爭理論、近代化理論，來解釋中國近代衰敗的原因，並反思如何抵抗帝國主義的侵略，重返強國之林。而本文以蔣廷黻、李鼎聲的近代通史題材為例，發現民族主義史觀分別與近代化史觀、馬克思主義史觀融合於文本中，尤此可見其重要性。第三，郭廷以做為草創時期的中國近代史研究者，在一九三零至四零年代初期的著述，也同時呈現追求「科學實證」和「民族主義」的雙面性。值得留意的是郭氏很自然將「近代化理論」做為「科學治史」的一環，也認為中國唯有朝近代化的方向進行，才能擺脫弱國的命運。從此可看出郭廷以將「科學」做為手段，達成救國之目的。最後，一九四九年前中國近代史研究，在史觀和研究方法上是非常多元的，而民族主義則是眾家著作中所共有的特質。郭廷以遷台後，處於「冷戰－內戰」的架構，這也對他研究的選題和史觀造成影響。如「近代中國外交史」中，對日本、蘇聯這兩個侵略國的歷史評價，雖都是負面陳述較多，但呈現「日本或可諒解，而蘇聯則是永遠無法諒解」的態度。此可反應在「冷戰－內戰」的國際政治背景下，將蘇聯視為國族的負面他者，已凸顯中日在當時的結盟關係。邊疆史著重中國邊疆地區「疆界」的確認，依據則是凡中國／中華民族經營過之處，都應被化歸入中國領土之中。近代通史則顯示一九五零和一九七零年代，郭廷以因所處時空不同，對於近代化史觀和民族主義史觀有輕重不等的倚賴。將郭廷以先生的近代通史研究，放置於當時國內外學界的背景來談，會發現他對「近代化」的定義和解釋雖因具有民族主義的關懷，而與國際學界、南港學派第二代學者皆有所差距。但基本上仍是「西方刺激－東方反應」的史觀，與當時國際學界以「近代化史觀」來研究中國的Fairbank仍是十分相近的。由此可見郭也非全然不採納西方理論，而是挪用西方理論架構，或借用理論的詞彙，而作為其民族主義史學的構成之一。相較於「保守派／中國文化本位派」的民族主義史學者錢穆，完全以中國傳統（儒家）文化為基底來撰史，以達成發揚國族文化的目的。 兩者的史著雖同樣具有民族主義傾向，但方法論和觀念上，似乎仍有頗大的差異。

**第四章 中國民族主義思潮下的「中國民族學」研究：以凌純聲為中心**

　　第四章，可分為三大節。第一大節，將以「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民族學」發展與凌純聲的學術研究」為題。第一小節，首先陳述西方民族學知識傳入中國，以及被建置化的過程。第二小節，首先將重點置於1920s-1940s年代日本帝國、大英帝國和蘇聯等帝國主義侵入中國邊疆地區的時代背景下，學術著作與中國民族主義的關聯性。其次，將考察凌純聲的學術著作內容，以其對赫哲族、苗族的研究為例，檢視其以何種方式研究？理論預設為何？最後，將考察以凌純聲為代表的歷史傳播論學派，與吳文藻代表的結構功能學派，在當時對「少數族群與漢族關係」的爭議。第三小節，考察遷台前凌純聲的學術著作內容，檢討其對赫哲族、苗族的研究，與中國民族主義的關聯性。第二大節，將以「戰後台灣的「中國民族學」發展與凌純聲的學術研究」為題。第一小節，先對日治時代、戰後初期文化人類學的建置與發展介紹，並將重點置於：日本學者對於「台灣原住民起源論」的爭議。第二小節，考察1950s-1970s年代，國際間美蘇冷戰，與台海兩岸對峙下，台灣人類學的發展過程。第三小節，將考察凌純聲遷台後的學術著作內容，以其對1.中國邊疆民族、2.中國文化與環太平洋地區的「原住民」（native/ aboriginal）的關聯性的研究為例，檢視其以何種方式研究？理論預設為何？與國際學界，和中國民族主義的關聯性為何？

　　以下分幾點陳述本文對二十世紀初期中國民族學的研究發現，並做更進一步的省思：第一，做為新興學門的「中國民族學」，乃是融合西方的現代民族學研究法，與中國傳統史書中的〈四裔志〉的漢文文獻考證。如以「少數族群的民族誌」此題材為例，一方面爬疏古典漢文文獻對特定族裔的觀察；另一方面，以現代民族學的參與觀察法、文化傳播論等，記錄並研究特定族裔的遷徙路線。上述知識生產方式，乃是在向西方尋求「科學方法」下，兼保有對傳統漢文資料的運用，但也因此形成「以己觀察異己」的方法論失誤，而使得草創時期的中國民族誌具有濃厚國族主義的傾向。第二，「中國民族學」學者也多援引當時西方而來的社會科學理論，以人類學南北派為例：南派重視德奧傳播論的運用；北派則對美國芝加哥學派的社區研究，和英國的結構功能論較感興趣。南派學者對擅長結合傳統漢文文獻與傳播論，研究對象以少數族群為主。也因他們與南京國民政府關係較為密切，故中日戰爭期間，不少南派學者如芮逸夫、楊成志等是在「大中華國族」的前提下，進行少數族群的識別與分類，試圖達到納四裔入中華的國族主義目標。第三，凌純聲做為草創時期的中國民族學研究者，在一九三零至四零年代初期的著述，也同時呈現追求「科學實證」和「民族主義」的雙面性。值得留意的是凌純聲的兩部民族誌研究，分別是在日本滿蒙不屬於中國論、西南泛泰／大泰主義的政治背景下的產物。兩部著作的結論，不約而同「證實」西南、東北邊區的少數族裔與漢族關係密切。從此可看出凌純聲將「科學」做為手段，達成救國之目的。最後，一九四九年前中國民族學研究，在史研究方法和主張上是非常多元的，而民族主義則是眾家著作中所共有的特質。 凌純聲遷台後，處於「冷戰－內戰」的架構，這也對他研究的選題和史觀造成影響。如「環太平洋研究」中，雖然根據傳播論的指導，揭示兩條傳播路徑，但在北路須經過中華人民共和國、蘇聯的領土，凌純聲既無法出田野，可能也是在國族主義作用下，僅針對南路說進行研究。而凌純聲也認為台灣島在南路傳播路線上扮演重要角色，其地位在於溝通中國大陸與環太平洋的文化。如此將台灣做為他者的做法，其實也帶有一定中國民族主義的色彩。邊疆民族研究上，則更進一步綜合體質人類學、語言學，作為其中華民族組成系統的架構，再添上民族學的精神和物質文化特質，以及民族史的考證和溯源。而將凌純聲先生的「中國與環太平洋」比較研究，放置於當時國內外學界的背景來談，會發現他基本上是採取德奧學派的文化傳播與核心區理論，再綜合漢文典籍，試圖建構「環太平洋文化均源自於中國」的結論，顯見其民族主義的企圖。而此種納四裔入中華的企圖，在同時代的學者芮逸夫身上，似乎也可見到以不同的學術譜系與研究方法，達成相似的目的－納四裔入中華。一九四九年後至七零年代以前在台灣的中國民族學研究，對馬克斯主義學派、結構功能派的研究方式基本上是很少，兩者分別到解嚴後，以及七零年代中期戰後第二代民族學者返國後，才在學界得以廣為傳播。

**第五章 　結論**

本文的結論，包含對歷史現場的重建，對既有史觀和理論的對話與檢討，分成下列五點說明之：

一、官方國族敘事與學術研究的關係

　　根據第三、四章的討論，顯示官方國族敘事雖然在南京國民政府時期已初步形成，但在當時對學術界的言論管控似乎不高。從中國近代史來看，主張馬克思主義史觀的著作，仍可經由正常的書籍流通市場傳播。郭廷以在三零年代所出版的《近代中國史》，也並非以當時官方國族敘事的「國民革命史觀」來寫作。從中國民族學來看，結構功能學派者雖然與南京國民政府在少數族群識別政策上分持不同的意見，其著作也不至於因此而遭到查禁。凌純聲對中華民族起源問題的解釋，仍以「多元論」的觀點為主，「一元論」僅為一種政治宣示。簡言之，南京政府當局的「國民革命史觀」、「中華民族宗族論」對此時期的「中國近代史」和「中國民族學」研究，並未產生明顯的箝制作用和影響。接著我們來看蔣介石治台時期的變化：此時的官方國族敘事仍以漢化政策、三民主義政策為主，就實質內容上並未做出重大的改變。唯二的改變，則是由於符應「內戰－冷戰」局勢下，對外以反共抗俄為主的民族政策，對內則強化台灣島的歷史、族群做為中華民族復興基地，以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論述。觀察學界的狀況，基本上此時書籍市場上已無流通馬克思主義相關書籍，對學術著作的管控確實也來得較嚴厲。然而，從第三、四兩章的研究成果，發現郭、凌兩者的學術研究在宏觀層次上雖不致於違背官方敘事，但在微觀層次上，顯然官方國族敘事有所不同。以下從兩者的研究內容思索：觀察郭廷以的史學研究，雖然與官方國族敘事類似，強調列強在近代對中國的侵略，特別是蘇聯。也強調民族遠古的光榮，與近代的國恥，以及抗日和未來反共的民族復興。然而，郭氏也以「近代化史觀」來詮釋中國歷史，強調是近代化程度不如人，才會在鴉片戰爭以來居於弱國，並主張唯有科學、民主等價值普遍，才有可能使得民族因強盛而復興。雖然郭氏的近代化史觀的終極關懷仍是國族，但在敘事結構上與官方國族敘事差異甚大，是兩種不同性質的中國民族主義。然而，除了《近代中國史綱》外，郭廷以的其它著作都未被查禁，可見在大方向均訴諸於民族主義的情況下，論述細微的差異是可見容於當局。接著觀察凌純聲的民族學研究，他發展出一系列中國與環太平洋比較研究，雖然是民族主義傾向十分濃厚的學術生產。然而，在中華民族起源的解釋上，凌氏來台後則更為偏向「多元論」的解釋，官方敘事所強調的「一元論」和「宗族論」則未見於其來台後的學術著作。從郭、凌兩者的例證，可知官方國族敘事對於學術生產的影響，若僅從論述層面來觀察，似乎僅是「大方向控制，小方向不論」的原則。

　　上述針對第三、四兩章的研究成果，加以深入分析所得出的結論。然而，此結論卻與第二章第四節的結論恰好相反。該節指出郭廷以的教科書、凌純聲的邊政學對特定議題的觀點，與官方國族敘事並無二致。第二章第四節，與第三、四兩章，針對「學術研究」和「官方國族敘事」的關聯性所做出的分析，形成弔詭的相反結論。此現象恰是本研究的重要發現之一：在不同的知識傳遞媒介上，學者對於官方國族敘事的「遵循程度」似有所差異。問題是吾人該如何思考此弔詭的現象？ 事實上，若從媒介的功能來看，教科書和邊政研究皆是應用性質濃厚，且與當局意識型態的推動具有密切聯繫的「學術知識生產」；近代史學和民族學則是學術價值較高、較屬於學術象牙塔裡頭的「學術知識生產」。因此，郭、凌二人從事「中國近代史」「中國民族學」研究時，較無須顧及當局立場，而可表達自己的觀點。反之，郭、凌二人從事教科書、邊政學的寫作時，他們則選擇官派委員和邊政官員的身分，故配合官方意識型態之推動，並沒有選擇堅持自己的學術立場。從本文的研究，說明了學者面對具有法律效力的官方國族敘事時，在不同的知識媒介上，針對特定事物選擇了以不同的學術觀點去詮釋。事實上，在歷史的時空下，郭、凌兩人做出如此的選擇，實乃凸顯他們「時代心靈的侷限」。

二、一九四九年後台灣學術史的兩種學術知識典範

就一九四九年的台灣的學術發展，中國近代史和中國民族學呈現兩種不同的典範。以中國近代史而言，幾乎是完全自中國傳統所橫向移植，即便如日籍學者伊能嘉矩所撰寫的《台灣全志》也不為人所重視。以中國民族學為例，研究南島語族，則大量採用日本學者的民族誌資料，以及考古資料。但這樣的採用，僅限於對史料，以及符應於大中國民族主義的「學術論點」。如凌純聲有注意日本學者留下的民族誌，對於文化特質(cultural-traits)的紀錄多半引用；對於族群溯源部分，對於他們的南方論之溯源則多加以抨擊，僅引用北來論，並改成更狹義的西來論。對於五六零年代南島語族的研究，亦有吸收。但吸收的重點僅在於名稱、分類的使用，至於族群溯源和遷徙，則是嫁接入自己的「亞洲地中海形成論」之中。反之，若日籍學者的著作觀點與凌純聲的假設不一致，則在引用上，產生史料的隱蔽和觀點的誤用。「中國近代史」和「中國民族學」在國民黨政府遷台後，對日治學術遺產的不同態度，已在王汎森等人的著作中提示。本文則從更微觀的視角，驗證此項說法。

三、西學／科學與中國民族主義

　　本文研究兩位受過現代學術體制訓練的學者－郭廷以與凌純聲，想要討論接受西學教育對他們的學術生產是否具影響？而本文的考察，顯示兩者均十分重視以科學、客觀和實證的方法來求證。即便欲達成納四裔入中華，或雪恥以民族復興的民族主義目的，但仍強調以「科學的方法」來求證。更進一步地說，凌純聲、郭廷以受過現代西式高等教育，擅長援引西方理論、使用新工具和史料，作為其學術研究的工具，但又不偏廢傳統中國學術的考證，與當時「史料學派」的傅斯年、胡適等人的研究方式較為相近。此派知識份子強調治學以「科學治學」的態度，在合理情況下考古、疑古以鑑別傳世文獻史實的真偽。對比同一時代，以柳詒徵、錢穆為代表，以延續和發揚傳統文化為本，輔以西學的「中國本位／新國粹學派」，兩派學者在方法論上大有不同，但均處於近代中國民族主義思潮下。以錢穆為例，其《國史大綱》也是一部根植於中國民族主義立場的書籍，但其治學方式、立足點是漢文古文獻，以訓詁、聲韻和文字等學術方式論，以證中國民族、歷史文化的延綿不絕。而郭廷以、凌純聲的學術研究雖然仍受中國傳統文獻學和考證學的影響，但添入不少的西方學術方法論，如郭廷以的近代史研究，注重中西史料的比較、檔案的挖掘、口訪資料的運用等；凌純聲的上古民族史／民族學的研究，則立基於考古學、體質人類學、語言學的分類基礎。而從本文的考察，郭、凌二人也是透過學術研究，以尋求中國／華民族的過去與未來。郭、凌兩者的研究方法顯示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史料學派的知識分子強調科學精神的啟蒙思維模式。如傅斯年〈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我們要科學的東方學之正統在中國！－此也強烈反應藉「科學方法」以實踐國族認同之旨趣。從本文的考察，反映二十世紀初期的中國，科學與民族主義的互動關係。此研究成果呼應於Hsiao-pei Yen（嚴曉珮）、James Leibold的先行研究，但本文更進一步對比當時中國學術界仍存在如錢穆、柳詒徵等堅守「從傳統文獻追尋中華民族過去與未來」的學者。

四、民族主義與人文社會科學方法論

　　本文大膽以兩個學科方法截然不同的學科，中國近代史和中國民族學為例，討論民族主義與人文社會學科發展的關聯性。在對郭廷以的中國近代史研究上，觀察到民族主義以滲入其歷史的「敘事結構」呈現之，以強調中國須雪恥，以復興民族，返回古代的榮耀。對凌純聲的民族學研究上，則觀察到其試圖以民族學所得出的證據，與日本，和歐陸的東方學者做對話，以強調中國族裔多元但卻鎔鑄於一體，以及中國族裔和文化廣泛傳播至環太平地區。

　　本文也觀察到各人文社會科學之間的知識，在橫向空間與縱向空間上的特徵。橫向空間方面，Bourdieu所提到The system of cross check －各學科之間的交互檢證系統，以針對某個議題提出更完整全面的立論。從本文的經驗研究上，也可顯見凌純聲、郭廷以的研究，均不限於本學科的立場，援以多重學科相互檢證，以達到中國民族主義的目的。縱向時間：各類人文社會科學與國族主義發生連繫的時間，可依下列序列顯示：十九世紀末，文學和神話學／黃帝神話－　二十世紀二零年代末後，考古學／北京猿人、民族學／四裔為中華民族、歷史學／國恥與民族復興－　再到二十世紀晚期，基因科學／南島語族、非洲出發論。

五、從主調／副調、考掘學、複線史觀看戰後台灣學術史的詮釋

　　在研究取徑中，本文以Michel Foucault、王汎森、Prasenjit Duara所揭示的取徑（approach），來看待一九四九年後台灣史。經過全文的求證後，以下詳細說明之：

　　Foucault揭示的「知識考掘學」、與王氏揭示的「主調／副調」，共同點都在說明在理解特定時空的史實時，不應以特定、唯一的史觀來詮釋之。目前針對凌純聲的先行研究，多半主張其民族學調查和治學方式以多元文化主義的觀點；針對郭廷以的先行研究，則主張其具有自由主義的精神，治學方式則尚實證主義的史料學，在史觀方面則重視近代化理論的運用。少部分的研究，則提到兩人具有民族主義的傾向。本文的主要議題是檢視郭、凌二人著作中的「民族主義觀點」為何？以何種方式呈現？研究成果顯示：就研究動機而論，兩者作為近代中國歷史與政治社會的個體生命，對歐美日列強的侵略，中國國族的積弱不振，確實都有所感觸。（從兩者的時事評論和口述訪談中的觀察）兩者作為學術工作者，他們的「生產的知識」在1949年前後，都與國際學界密切交流和對話。交流和對話的動機，則具有追求「民族主義」的主調，與講求「學術真理」的副調。如郭廷以之於「近代化理論」，凌純聲之於「文化傳播理論」和「南島原鄉論」，兩者都將理論或觀點導向「建構中華國族」之目的。再如郭氏以「中國近代史」來界定國族的疆域範圍，描述國族與「國族他者」的形象。凌氏以「中國民族學」來釐清國族的起源，以及國族的組成份子。這些主題的選擇，在不同時空背景下，分別具防止境內少數民族自決的「內在分化」、抵抗日本帝國、蘇聯和中共的「外在威脅」，以達成維繫國族統一和安危之目的－這顯然具有民族主義的動機。就資料蒐集和推論過程，兩者均曾在著作中宣稱以「科學方法」和「實證主義」進行，展現中國新派知識分子在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秉持啟蒙與理性態度來從事學術研究。然而，本文的研究，也證實兩者在資料的蒐集和解讀上，仍有不少邏輯上的失誤，而此與兩者的民族主義傾向有所關聯性。就觀點而論，兩者皆具有鮮明的民族主義傾向，但同時也具有其它觀點的傾向。如郭廷以是近代化史觀與民族主義史觀的混合；或是以近代化為手段，而仍以拯救國族為終極目的。凌純聲終生致力於少數族群研究，觀點上也強調少數族群的「文化特殊性和稀有性」，這無疑具有多元文化主義的色彩。但從總體來看，凌純聲仍是將「多元的少數族群文化」當作是「中華國／民族多元一體的文化」。上述對郭、凌兩者的研究動機、資料蒐集和推論、觀點討論，呼應Michel Foucault、王汎森的說法，歷史時空的複雜性，並不能以單一觀點來解釋／劃分，一個學者在意識形態上可能兼含民族主義／實證主義／多元文化主義等。當然一份「一流」的學術研究，也不會僅是客觀資料的推積，仍是具有其研究所欲對話的對象，以及預設的理論／概念框架。 以「史料學派」和「史料學」等名詞，即想概括傅斯年、郭廷以和凌純聲等「一流」學者，對他們恐怕不是讚譽，而是毀謗。我們必須做的，則是複雜化「特定空間的橫切面」，意即確認時代主調之餘，也嘗試探詢其它副調的存在，甚至進一步做到探討主調和副調的關聯性。本文的研究成果，某程度上說明了過往台灣學界，多以史料學派、實證主義、自由主義和多元文化主義，來解釋和總括戰後台灣、近代中國學術思想史的「不足之處」。另一方面，全以民族主義解釋，也是另外一種不足。

　　本文引用Duara的複線史觀，說明後人在詮釋歷史時，會出現「散失」和「傳承」。就第一層次而言，為何過往較少從「民族主義」的視角，考察郭廷以、凌純聲的學術研究？這其實牽涉到今昔學術界對民族主義學術觀點的評價問題：事實上，在歐美日列強入侵、戰禍綿延的近代中國，產生民族主義思想十分正常，在歷史的現場也是被官方，乃至當時的有志之士加以鼓勵的思潮。自南京國民政府起，掌握中華民國統治區近半世紀論述的孫文「三民主義」，其中便包含民族主義的思想在內。作為近代中國民族主義思潮下的個體生命，凌純聲、郭廷以在學術研究中寄予民族主義觀點，是再理所當然不過的事情。然而，在如今自由主義／多元文化主義當道的學術界，對在各自領域「桃李成蔭」的郭廷以、凌純聲，很少有研究者願意甘冒「大不敬」的風險，以解構、批判的立場，去檢視兩人學術研究中帶有的民族主義觀點。如研究途徑所示，現今學界主流的論述，仍是高度推崇兩人不畏強人政治，秉持實證主義和自由主義的立場，從事學術工作和學術研究。筆者認為此種狀況導致現今對兩人的詮釋，「傳承」兩者的自由主義和實證主義觀點，而「散失」了兩者的民族主義的觀點。就第二層次而言，為何郭、凌的學術研究中，分別「傳承」國民革命史觀、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組成，「散失」了諸如共產革命史觀、少數族群得以「民族自決」的觀點？從本文的考察，顯示兩者可能是在民族主義，或官方國族敘事的影響下，做出如上的判斷。